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as Viewed from Vantage Points of Foreign Nations

—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 as Insight for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ought

Yu Zuhua

Abstract: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fers here to the rise of China, after a long decli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ra, to a highly esteemed and honored position it used to occupy in ancient times among the rank of first nations as an affluent,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country with grea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a discourse system must be sustained by the existence of some foreign or alien entity as objective confirm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country as a discoursing subject. For the “subjective self”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foreign entity” consist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nations colonized by them, all serving the function of mirroring back to China its real state.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decline of colonized or semi-colonized countries is the best lesson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doing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make their country great again. On one hand, modern Chinese thinkers have chosen some conquered colonial countries as comparative objects for reference and warning examples of past failure to strengthen the “genocide” image and further urge the Chinese people’s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for national revival; on the other hand, modern Chinese thinkers have taken learning from Western powers seriousl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Japan. After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some countries’ re-emergence from the downtrodden pit to eminence and power again, they draw certain guiding lessons which they believe China could also benefit from. For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y believe what a rising China needs would be a system of centralized government propounded by the Italian politician Machiavelli. For economic revival, they advocate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For education, they sugges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 and Germany, pointing out that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first step for a country’s rejuvenation”. On the whole,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zed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lways bearing in mind the idiosyncratic natur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ir own nation,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nd explored multiple possible ways for China’s rejuvenation, broadly speaking, going through stage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returning to the East, and finally the creation of a “third type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ought; Western Powers; Founding History; History of a Country’s Downfall

Author: **Yu Zuhua** received his BA and MA in history respectively in 1981 and 1985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ince then he has been teaching at the Lu Dong University (formerly Yantai Formal College). He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ship in 1996 and in 2008 became a receiver of special government allowance award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4, he was received into the “National Key Talent Project” and became a title holder of “Middle-aged and Young Experts of National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e same year, he earned his PhD in history fro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e was once dean of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lso for some time hea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both of Lu Dong University. Now he is the de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which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ulture histor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New Treatise o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Study on the Trend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Spirit*, *The Pursui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 Dream Crossing Two Centuries, Between Clutch: the Three Modern Trends of Thought in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對異國異族觀照下的文明再造

——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對“列國經驗”的借鑒

俞祖華



[摘要] “民族復興”是指在古代雄踞於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後，重新走向興盛、輝煌，重新發展成為處於世界先進行列、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大國強國。“民族復興”話語作為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離不開與異國異族形象的比較、對照。相對於中華民族這一“自我”，“他者”除了作為殖民者的西方列強，還有與中國一樣淪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其他非西方國家。西方列強的建國史、興國史與非西方殖民地國家的失國史、亡國史，對於正處在亡國危機之中、正在為民族復興而不懈努力的近代中國人來說，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近代思想家一方面選擇已經“亡國”在先的殖民地國家，作為外部參照物，作為“殷鑒”與“前車之轍”，進一步強化“亡國滅種”意象以警示國人，激發其為民族復興而不懈探索；另一方面，非常重視學習與借鑒西方列強的大國崛起經驗，非常重視重溫與吸收歐美與日本的富強、興國之道，尤其是格外重視一些國家如何在災難之後變得強大、在衰弱之後再次崛起的經驗。他們根據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對中國復興提出相關建議，如在政治建設方面，認為意大利的復興是聽從了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主張，中國的復興也必須步其後塵而努力；在經濟復興方面，主張全面分析國際經濟環境，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家應對經濟恐慌的政策；在教育興國方面，主張借鑒日本、德國重視教育的經驗，指出“要使國家和民族復興，非從教育着手不為功”。中國近代思想家對民族復興的實現途徑雖然探索角度不盡一致，但在大致軌跡上呈現出從學習西方、回歸東方到創造“第三種文明”的演變。

[關鍵詞] 民族復興思想 西方列強 建國史 亡國史

[作者簡介] 俞祖華，1985年、1988年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到魯東大學（原煙臺師範學院）任教至今，1996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2008年被評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14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並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2014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社會科學處處長，現為中國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國近代改造國民性思潮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中華民族精神新論》《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思潮研究》《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型》《現代文明的追尋——穿越兩個世紀的夢想》《離合之間：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關係》等。

“民族復興”是指在古代雄踞於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後，重新走向興盛、輝煌，重新發展成為處於世界先進行列、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大國強國。基於此，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既正視祖國暫時衰落以致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現狀，並重視對落後、衰亡原因的分析，也致力於探索中華民族衰而復振、實現復興的道路與方案。同時，他們還注意以“他者”為參照反觀自我，以朝鮮、越南、波蘭等國的亡國史警醒國人，並據以分析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之原因；以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列強的復國復興經驗、大國崛起經驗告誡朝野，並加以借鑒以探尋民族復興的路徑模式；以列國的亡與興，對照、檢討近代中國的衰落之因，尋求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一 “他者”視閾：“民族復興”話語的外來元素

“民族復興”話語，無疑是極具民族主義色彩的表述，但在西方列強處於強勢、西方話語處於中心的特定歷史背景之下，即使是民族復興這種頗為“自我”(self)的言說，也帶着鮮明的外來色彩、外部印記。在近代中華民族復興話語的萌發、形成、高漲過程中，西方學理、國際競爭、世界排名、他者眼光、“列國經驗”“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等外來元素，如影隨形，一直發揮着重要的影響與作用。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復興話語作為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自我形象，離不開西方作為“他者”(the other)這一外界參照物的存在^①，離不開與異國異族形象的比較、對照。

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正是通過與西方這一“他者”的對比對照，認識與確認“自我”，逐步建構起中華民族既不自負又不自卑的民族意識，逐步建構起平視“他者”、與他國平等相處的世界意識。這包括：在中華民族的“自我”定位上，摒棄以“天朝大國”“中央大國”自居的虛驕、自負心態，摒棄以中華文化為最優、“西方物質文明雖好，中國精神文明更高”的中國文化優越論，同時又對暫時落伍的祖國實現趕超發展、實現振興復興充滿信心，對暫居弱勢的中華文化再現輝煌充滿信心。在外部世界的認知上，摒棄以“西夷”“紅夷”之稱蔑視西方民族，以“島夷”“倭國”之稱蔑視日本民族，轉而以平等乃至羨慕的目光介紹與認知西方各國、世界各國。魏源(1794—1857)在《海國圖志》中仍將西方國家稱之為“夷”，潛意識中還有居高臨下的心態，但卻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開啓了近代中國重新定位“自我”與“他者”、重新認識國情與世情的思想歷程。到19世紀50年代，“洋”“洋務”逐步替代含有貶義的“夷”“夷務”，尤其是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第51款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敍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之後，“夷”字在清政府的官方文書與正式場合中消失。此後，洋務運動登場，“洋務”取代“夷務”成為趨勢；到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學習西方更被稱為“時務”。這種涉外事務指稱的變化，反映了國人對外部世界、國際形勢的不同認知。在中華作為“自我”與外部世界作為“他者”的相互關係上，由激烈競爭的“萬國”組成多元世界的世界觀替代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己國為世界”的天下觀，列國並立、西方強勢的世界秩序、殖民體系替代了萬邦來儀、華夏中心主義的華夷秩序、宗藩體系。認識到中國只是世界衆多國家之一，且面臨任人宰割、任人魚肉的命運，必須建設現代民族國家，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視野裏，相對於中華民族這一“自我”，“他者”除了作為殖民者的西方列強外，還有與中國一樣淪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其他非西方國家。如果說西方列強是以其大國崛起經驗，吸引國人將目光投注到西方以尋求富強、尋求復興之路的話，那麼，那些與中國同病相憐的非西方國家的“亡國史鑒”，則有助於國人分析中國何以貧弱，有助於國人堅定擺脫國家屈辱命運的決心。西方列強的建國史、興國史，與非西方殖民地國家的失國史、

^① 在西方後殖民理論中，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而非西方世界則被視為“他者”。但“他者”與“自我”是相對的。西方人在觀察、研究中國，中國人也在觀察、研究西方。正如王銘銘在《西方作為他者》(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一書中所指出的，非西方並不是被動等着西方知識人拿顯微鏡來觀察的“地帶”。以近代中國為例，長期被西方人冠以“封閉”“褊狹”“不開明的”的中國人，也在其域外的旅行與世界的想象中締造出其自身的他者觀念。

亡國史，對於正處在亡國危機之中、正在為民族復興而不懈努力的近代中國人來說，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正如《新民叢報》一則關於《埃及近世史》的圖書廣告中所說：“讀建國之史，使人感，使人興，使人發揚蹈厲。讀亡國之史，使人痛，使人懼，使人怵然自戒。”^①

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落與未來的復興，首先是相對於西方這一參照物而言的，衰落是“不如夷”“不如人”、落後於西方，而復興則是要恢復世界領先地位、要趕超西方與日本。之所以承認相對於西方的衰落，如馮桂芬（1809—1874）所說的“人無異才不如夷，地無遺力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②，胡適（1891—1962）所說的“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③，目的是期待趕超西方的復興，如魏源所說“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④；馮桂芬所說“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⑤；楊度（1875—1932）所說，中國自然條件優越，如果能以金鐵主義立國，提振經濟與軍事實力，則“其適於生存而可與列強馳騁於世界可斷言矣”，“即以今世各文明國稱霸於經濟戰爭中者比之，雖以一敵數不難也”。^⑥

作為外部參照物，與近世中國有着“相似歷史”的衰亡國家，對中華民族復興話語也有深刻、沉痛的啓示。“亡國之慘狀”的描繪，可以震驚國人，使他們深刻認識到實現民族復興的必要性、緊迫性，“搜羅世界上已亡國之慘狀，錄為一集，以貢獻之於將亡之國民，固亦吾人義務之所不容已也。聞者苟稍有人心，大為醒悟，而早自為計，則東亞病夫三百年來之大病庶有療乎？”^⑦讀亡國史，可使“亡國破家之禍，日懸於四萬萬人心目之間，而懼我之為波蘭，懼我之為印度，懼我之為埃及、羅馬，積懼而奮，積奮而團，積團而競生存，不但今日東三省幸免於俄，兩廣幸免於法而已”^⑧。

“衰亡之原因”的剖析，可以啓迪國人，使他們從“相似歷史”中汲取歷史教訓，更清醒地檢討中國貧弱的病根，更好地尋求使中國由貧弱到富強、由衰亡到復興的藥方。例如，與中國同為文明古國的埃及，其亡國史就可使國人“戒懼”、猛醒。“埃及與中國最相類也，其古代之文明相類，其近世之積弱而中興、中興而復積弱相類”，埃及“以中興之國，乃至溘然崩敗，推求其故，實由借外債而任外人。以埃及蕞爾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金，一切內權，皆歸其手。夫以外人而治內政，不諳情勢，不習民俗，其措置已多窒礙。況乃倒授太阿，主權喪失，卒以是故，坐召外人之干預，反復相尋，遂藩其邦而奴其族”。^⑨有的論者還將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與其他亡國、失國的國家加以比較，認為中國的自然條件更為優越，歷史文化傳統更為深厚，更有條件因而更應實現民族復興、趕超世界先進。楊度就認為，歐洲的土耳其、塞爾維亞，美洲的南美諸小國，亞洲的波斯、朝鮮等，與中國一樣，在國際軍事、經濟競爭中敗於列強，淪為“二等以下之國”，但“彼等之國一敗不可復振，何獨中國不然”？這是因為，“以中國之土地論，則四百餘萬英方里，占世界陸地總面積十二分之一；以中國之人口論，則四萬（萬）五千萬人，占世界人口總額四分之一；以土地上之財產論，則在世界為獨一無二之寶庫。以固有之資格，亦既戰勝列強而居於優勝矣”；“夫使中國人能利用其固有之資格，奮起直追，以與列強相逞，則憑其資格之美，豈僅土耳其、塞爾維亞、波斯、朝鮮、南美諸小國等之天然與人為俱劣，一敗不可復振者可比”。^⑩通過與衰亡國家的比較，他們對實現民族復興的可能性、現實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①⑨ “紹介新書”，《新民叢報》6（1902）；《新民叢報》（北京：中華書局，2008，影印），第1冊，第758、758—759頁。

②⑤ [清]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製洋器議”，《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馮桂芬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第326、328頁。

③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卷，第667頁。

④ [清]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三”，《魏源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第4冊，第31頁。

⑥⑩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22頁。

⑦ 直齋（趙仲）：“腥風血雨錄”，《雲南》4（1907）；《雲南雜誌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第700頁。

⑧ 書樓：“教育會為民團之基礎”，《江蘇》3（1903）。

步認識，從而堅信中國絕不會“一敗不可復振者”，堅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復興。

認識他者，有助於反觀自我。與西方列強的對照，與非西方殖民地國家的比較，有助於先驅者建構清醒的自我意識，這包括更清醒地認知中華民族目前落後西方、瀕臨亡國的危險處境與“大而弱”“處於半殖民地之下”的國際地位，從而激發趕超西方、避免衰亡、恢復中華民族世界領先地位的強烈意識。馮桂芬、孫中山（1866—1925）等人先後表達過恢復中華民族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強國地位的思想。馮桂芬提出，通過師夷、自強，“夫而後內可以蕩平區域，夫而後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後可以復本有之強，夫而後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為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①孫中山提出：“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纔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②

在華夏中心主義的視野裏，華夏、中華是“自我”，四裔、夷狄是“他者”，自視為“衣冠禮儀之邦”，而視周邊民族為“獸迹鳥迹之區”，對自身、對世界的認識都帶有盲目性。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裏，西方殖民者是“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則被稱為“他者”，西方社會以文明世界自居，中國人被視為野蠻人、被形容為“黃禍”，顯然是戴着有色眼鏡。近代中国的先驅者在建構民族復興話語時，注意超越華夏中心論與西方中心論，駁斥了“華夷之辨”“黃禍”等錯誤觀點，表示中華民族一定會實現復興、從而避免被欺凌的命運，也一定會傳承愛好和平的美德，因而不會給外部世界帶來威脅。

二 亡國史鑒：警示國人的清醒劑

近代中國在對外戰爭接連失敗，尤其是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被“蕞爾島夷”日本擊敗之後，舉國上下所充斥的是“國將不國”的危機感。有識之士不斷發出“亡國滅種”的強烈示警信息，如康有為（1858—1927）大聲疾呼，“竊以為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③，痛陳“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啓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④。梁啟超（1873—1929）則警示：“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之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⑤嚴復（1854—1921）指出，如果士大夫為一己之私昧不知變，“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⑥。儘管當時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但暫時還沒有淪落到失國亡國、淪為完全殖民地的最壞地步。因此，近代思想家又選擇已經“亡國”在先的殖民地國家作為外部參照物，作為“殷鑒”與“前車之轍”，進一步強化“亡國滅種”意象以警示國人，激發其為民族復興而不懈探索。在他們看來，在那種面臨列強瓜分的危急時刻，非西方殖民地國家的亡國史，相對於西方列強的興國史，對國人而言更具有啓迪和現實意義，“處將亡之勢，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則與其讀建國史不如讀亡國史”^⑦。

對外國亡國史的引述、譯編、介紹，主要採取了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在奏折、政論中引述他國“亡國史鑒”進行夾叙夾議。康有為在1895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書》中以土耳其、印度為例指出：“夫財智之民多則國強，財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消，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⑧在1897年12月5日的《上清帝第五書》中總結了殖民地國家亡國失國的四種類型：“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

①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製洋器議”，《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馮桂芬卷》，第328頁。

②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9卷，第244—253頁。

③④⑧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集，第32、68、42頁。

⑤ 梁啟超：“南學會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1冊，第65—66頁。

⑥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1冊，第4頁。

⑦ “紹介新書”，《新民叢報》6（1902）；《新民叢報》，第1冊，第758頁。

有遍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①在 1898 年 1 月 29 日的《上清帝第六書》中，列舉了在西方列強殖民侵略之下，“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又其甚則且如土耳其之幽廢，如高麗之禍及宮闈。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又如波蘭之宰割均分而舉其國土。馬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釁不在大”。^②梁啟超在 1896 年發表的《變法通議》中，強調非變法不能自救，“自變”則存，“不變而變”則亡，總結了“自變”“不變而變”的四種結局：“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並於一國而待變者也（越南、緬甸等國皆是）；其四，如波蘭，見分於他國而代變者也。”^③日本通過“自變”而由弱致強，其他三類國家則因“代變”而亡國。他在 1901 年發表的《滅國新法論》中，列舉了西方列強以“滅國新法”施之於埃及、波蘭、印度、菲律賓等弱國導致其滅亡的例子。在各國亡國史中，波蘭常被提及。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就提到了波蘭衰弱的過程。到了清末，波蘭幾乎成爲亡國的“符號”與代名詞。除了以波蘭亡國爲主題的書籍、文章外，其他文章也常引述波蘭作爲“亡國史鑒”。有學人對張柟、王忍之編撰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中涉及波蘭亡國史的篇目進行了統計，“該書中共有 398 篇文章，其中涉及波蘭亡國史的文章共有 39 篇，約占總數的 9.8%”^④。

二是報刊中直接以他國“亡國史鑒”爲主題的專論。涉及多國“亡國史鑒”的如：《杭州白話報》1903 年第 15—24 期連載的《世界亡國小史》。關於波蘭亡國史的文章有：《波蘭滅亡記》（《時務報》1896 年 8 月 29 日），《波蘭國的故事》（《杭州白話報》創刊號，1901 年 6 月 20 日），《波蘭滅亡始末記》（《經濟叢編》1902 年 10 月 16 日、30 日），《波蘭亡國之由》（《外交報》1903 年 5 月 11 日），《講俄國與普奧兩國瓜分波蘭的事》（《俄事警聞》1904 年第 44、49、50、52、54、56、65、67、68、69、70、71、72、73 號），劇本《瓜種蘭因》（《警鐘日報》1904 年 8 月 20—31 日，《安徽俗話報》1904 年第 11—13 期）等。關於朝鮮亡國史的詩文有：《朝鮮亡國史略》（《新民叢報》1904 年 9 月 24 日、10 月 9 日）、《日本之朝鮮》（《新民叢報》1905 年 1 月 6 日）、《嗚呼韓國！嗚呼韓皇！嗚呼韓民》（《政論》1907 年 10 月 7 日）、《日韓合併問題》（《國風報》1910 年 7 月 17 日）、《朝鮮滅亡之原因》（《國風報》1910 年 9 月 14 日）、《日本併吞朝鮮記》（《國風報》1910 年 9 月 14 日、24 日）等，另有《朝鮮哀詞》《麗韓十家文抄序》等文學作品。其他文章還有：《論韓國亡》（《香港華字日報》1905 年 11 月 28 日），《論高麗亡於日本》（《香港華字日報》1906 年 1 月 3 日），《聞韓王將廢事感書》（《香港華字日報》1907 年 7 月 18 日），《哀高麗》（《香港華字日報》1909 年 11 月 16 日），《韓國滅亡史》（《東方雜誌》1906 年第 3 號），《哀韓篇》（《大公報》1907 年 8 月 19 日），《哀亡韓》《大公報》1910 年 8 月 27 日）等。關於埃及興亡史的文章有：《埃及百年興衰記》（《經濟叢編》第 1、2、4、5、7、16、17、18、19、20、29、32、40、41 冊連載），《埃及亡國慘狀記》（《遊學譯編》1903 年第 8、11 冊連載），《埃及近世史》（《童子世界》1903 年第 11、13、15、23、25、26、30、31 號），等等。關於印度亡國史的文章有：《印度蠶食戰史》（《勵學譯編》1901 年第 1—10 期、1902 年第 11—12 期，後由杭州譯林館出單行本），《印度滅亡之原因》（《浙江潮》1903 年第 1、5 期），《印度滅亡史（演稿）》（《童子世界》1903 年第 4、8、9、12、20、22、24、28、32 號），《印度滅亡的原因》（《童子世界》1903 年第 29、33 號）。關於越南亡國史的文章有：《越南亡國慘話》（《第一晉話報》1905 年第 6 期），《安南亡國後之痛史》（《東方雜誌》1910 年第 8 號）等。其他還有《菲立賓亡國慘狀紀略》（《湖北學生界·漢聲》，1903 年 5 月 27 日、9 月 21 日），《緬甸滅亡小史》（《雲南雜誌》1908 年第 15 號），《緬甸史》（《雲南雜誌》1908 年第 13、14、16 號）等。

①康有爲：“上清帝第五書”，《康有爲全集》，第 4 集，第 4 頁。

②康有爲：“外釁危迫分割湧至急宜及時發憤大誓臣工開制度新局摺”，《康有爲全集》，第 4 集，第 12 頁。

③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 10—11 頁。

④馮克學：《波蘭亡國史與晚清民族主義書寫》（南京：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2），第 23 頁。該文統計仍不全面，如《國民報》第 1 期刊發的《原國》《二十世紀之中國》等文章，也以波蘭亡國史爲例進行論證。

三是綜合論述幾個國家亡國史的書籍。如《亞西亞西南部衰亡史》（譯書彙編社，1902），詳敍歐人殖民侵略之下印度、安南、緬甸等國衰亡的歷史；《近世亡國史》（殷鑒社，1911），記朝鮮、越南、緬甸、印度滅亡事實及亡國後之慘狀；《世界亡國慘史》（醒社，1915），是梁啟超以其舊作《波蘭滅亡記》《越南亡國史》《朝鮮亡國史略》等舊作為基礎編輯；《亡國鑑》（上海泰東書局，1915），輯越南、朝鮮、緬甸、印度、波蘭、埃及六國滅亡之陳迹，以警告國人；《世界亡國史》（泰華書局，1915）、《世界亡國稗史》（上海交通圖書館，1917；上海進益學社1928年更名為《亡國痛史》再版），分述印度、埃及、緬甸、波蘭、安南、朝鮮等國的亡國經過；《世界亡國痛史》（上海時化書局，1932）、《古今各國亡國鑑》，包括朝鮮、臺灣、安南、緬甸、印度、埃及、波蘭、阿比西亞的歷史；等等。

四是專門論說某一國家亡國史的書籍。關於波蘭亡國史的著述有：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進呈光緒帝的《波蘭分滅記》；日本灤江保《波蘭衰亡戰史》（有三種譯本：譯書彙編社編譯，1901；薛蟄龍（公俠）譯，上海鏡今書局，1904；陳澹然譯，江西官報社，1904，更名為《波蘭遺史》）。關於朝鮮亡國史的著述有：李芝圃《朝鮮亡國史》（直隸教育圖書局，1911），梁啟超《朝鮮滅亡慘史》（醒社，1915），吳山（大同山人）《朝鮮亡國慘史》（道路月刊社，1932），倪軼池、莊病骸《朝鮮痛史——亡國影》（愛國社，1915），盧天牧（閑閑居士）《三韓亡國史演義》（杞憂社，1919），廣文書局編譯《朝鮮亡國演義》（上海世界書局，1921），沈桑紅、藍劍青《朝鮮遺恨》（上海滬報館，1932）等。關於埃及亡國史的著述有：日本柴四郎《埃及近世史》（有三種譯本：麥鼎華譯，廣智書局，1902；出洋學生編輯，商務印書館，1902；章起謂譯，商務印書館，1903）；日本北村三郎《埃及史》（趙必振譯，廣智書局，1903）；《埃及慘狀》（文明書局，1903）等。關於印度亡國史的著述有：《印度滅亡戰史》（夏清馥譯，上海群宜譯社，1903）；《印度史（一名印度蠶食戰史）》（王本祥譯，上海啓聞社，1903）等。關於越南亡國史的有：潘佩珠《越南亡國史》（廣智書局，1905）等。

清末以來對亡國史的關注，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發展，與民族復興思潮的醞釀、定型，基本是同步的。亡國史的書寫，成為民族主義表達的獨特話語體，成為民族復興思想的強力催生素。

其一，近代仁人志士通過對列強亡國之心、滅國之法的揭露，警示國人世界各民族都在為生存而競爭、國際形勢異常嚴峻兇險，祇有發憤圖存、自立自強，纔能在優勝劣敗、弱者先絕的國際生存競爭中立足，纔能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康有為在1898年8月進呈光緒帝的《波蘭分滅記》中指出：“觀於波蘭之分滅，而知國不可不自立也，俄為虎狼之國，日以併吞為事，大地所共聞也。”^①為了避免“我真為波蘭矣”的危局，他建議光緒帝及早變法自強、保國自立。梁啟超在1901年發表的《滅國新法論》中指出，“滅國”是“天下之公例”，“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為優而勝者所吞併”，西方列強以各種“滅國新法”施於弱小之國，“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埃及、波蘭等國紛紛滅亡，當此將滅未滅之際，中國必須自立自強，決不能寄希望於列強“保全”，“我四萬萬人不講所以興國之策，而竊竊焉冀其免於滅亡，此即滅亡之第一根源也”，“聞列強之協助中國也，則色然以喜，此又滅亡之第二根源也”。^②

其二，近代仁人志士通過亡國之慘、滅種之痛的描述，警示國人必須致力於實現民族復興，纔能避免步波蘭、印度等國之後塵，纔能改變近代以來面臨的屈辱命運。1901年《國民報》第1期刊文指出：“印度人無國，而頻年薦飢者飢欲死；波蘭人無國，而遷於西比利亞者寒欲死；埃及人無國，貧欲死；猶太人無國，富欲死。”中國一旦亡國，無以立國，“所謂中國人者，地球上永無容身之地”，“前事已矣，過此以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恢復我中國之固有乎？抑甘隨波蘭、

^① 康有為：“波蘭分滅記序”，《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397頁。

^② 梁啟超：“滅國新法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9頁。

印度、埃及、土耳其之後塵，且等而下之乎？其興其亡，決於今日”；^①中國“固具有雄視宇內，威震環球，操縱萬國，轡轡之資格”，國人當尋求“恢復之路”，使“我中國為地球萬國之表率矣”。^②

其三，近代仁人志士通過衰亡之因、亡國之由的剖析，深刻認識到國家興亡取決於國民，因而致力於激發國人的愛國觀念、合群觀念與民族精神，共同為實現民族復興而不懈努力。康有為在《波蘭分滅記》中指出，波蘭分滅之由，“一以強鄰干涉其國政”，“一以國民不合而上下隔塞也”，雖有選舉，但大權落在守舊大臣手中，“而民庶熙熙，猶不知國之將亡，而莫解憂患也”，“是以民無政權而終至滅亡者也”。^③李芝圃在《朝鮮亡國史》序中指出：“使朝鮮君民同體，上下一心，嘗膽臥薪，力圖恢復，雖不能同日爾曼之復興，意大利之再振，則箕子遺宗，亦不至隨漢水滔滔而俱逝也。然返觀朝鮮，其內政之腐敗如故也，其黨派之紛爭如故也，其人民之愚昧如故也，優勝劣敗，天演難逃。”陳懷在《讀埃及近世史跋尾》裏說：“必人人心中有愛國之思想，人人目中有愛國之觀念，然後仆者起，廢者興，死者生，亡者存。”^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民族復興思潮高漲，有學人撰文總結了民族盛衰的兩條鐵則：“整個民族都祇想安富尊榮，輕視勞動，生活複雜，體格衰弱，而為其底層的大眾，都是且離心離德，那末那個民族就由發展而向滅亡之途走去。整個民族都是刻苦耐勞，不厭勞動，生活簡單，體格健壯，而整個民族不分階級，一心一德，組織整肅，那末那個民族就向發展之途走去。”^⑤正因為國民精神狀態與民族復興能否實現密切相關，啓蒙思想家非常關注國民性、國民心理之改造，視其為“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復興民族的根本方法”。

其四，近代仁人志士通過殖民地國家亡國與西方列強興國的比較，深刻認識到守舊、封閉必然導致落後挨打，變革、開放纔能實現民族復興。康有為在第二、三次上清帝書中，以土耳其守舊亡國、日本維新強國作為對比，指出：“近日土耳其為回教大國，不變舊法，遂為六國割地、廢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⑥“以土之大，不更化則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⑦救亡圖存、民族復興需要變法、革新，而且是需要“大變”“全變”，需要深刻、全面的改革，需要不失時機地推進現代化轉型，否則，仍難以避免亡國的厄運。他在《波蘭分滅記》中通過俄、波兩國的改革加以說明：“當大變之時，非大武無以撥易更改。觀俄彼得之所以強，觀波蘭之所以亡，其欲變、知變也同，而興亡迥異，豈有他哉？變法之勇與不勇異耳！”^⑧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指出，中國雖然也意識到需要變法更張，需要學習西方，但講求洋務三十餘年“不知本原”，不像日本直接導向學術、政制，所以前途迥異。他說：“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⑨他們以殖民地國家因守舊、封閉導致衰亡，反證了改革開放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民國時期尤其是“九一八事變”發生、民族復興思潮形成之後，各界人士在探討近代民族衰落原因與實現民族復興之道時，對殖民地國家亡國教訓，也極為重視，並多有借鑒。新中國學會出版了《捷克建國記》等著作。岑有常撰文介紹了波蘭愛國志士在屢次亡國之時為光復舊物“屢蹶屢起”，尤其是讚揚了畢爾蘇斯基（J. K. Piłsudski，1867—1935）力抗外敵的“毅力與勇氣”。^⑩

① “原國”，《國民報》1（1901）；《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張樹、王忍之編，第1卷上冊，第65頁。

② “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報》1（1901），《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67頁。

③⑧ 康有為：“波蘭分滅記”，《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398—399、423頁。

④ 陳懷：“讀《埃及近世史》跋尾”，《新世界學報》3（1903）。

⑤ 張水淇：“民族盛衰之因果”，《復興月刊》3（1932）。

⑥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44頁。

⑦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83頁。

⑨ 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選集》，第11頁。

⑩ 岑有常：“波蘭復興偉人畢爾蘇斯基”，《復興月刊》1（1932）。

甘豫立撰文介紹了“發軔於十九世紀之初”“盛倡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而成功於歐戰以後”的“土耳其之復興運動”，稱有“病夫”之稱的土耳其，在“甘末爾揭竿而起，以扁鵲華佗自任”後，終至於“體壯力強，精神煥發，居然返老還童，而建立意想不到之復興偉業”。^①陳振鷺撰文闡述了全民連責、全民族團結對於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性，認為一些文明古國的衰落、滅亡乃“無全民連責之紐帶則亡”，印度為“東方文明古國”，“被區區三島之國統治而莫克翻身”，“迄今印人猶在英帝國主義者鐵蹄之下呻吟”，是因為其內部互相仇視、衝突，“從未見有一種全民連責之紐帶，繫貫其間，既無團結一致之精神，亦無向上發展之志願”；埃及也是文明古國，“倘使人民邁進，團結振作，未始不可以繼往開來，長作有為之民族”，不幸在一度創造文化之後“即不思振作，奢靡不動，因循腐敗，毫不見其民族有何種膠質，足以團結其集團”；朝鮮為東亞古國，“初則有宮廷政權之爭奪，繼則有親華親日之分派，後復有東學黨之內亂”，也因“無全民連責之紐帶”而自取滅亡。^②

三 興國經驗：民族復興的教科書

中國近代思想家在探討民族復興之路的過程中，既重視學習與借鑒西方列強的大國崛起經驗，又重視重溫與吸收歐美與日本的富強、興國之道，但鑑於自身是在近代落伍後尋求趕超先進國家，因而格外重視一些國家如何在災難之後變得強大、在衰弱之後再次崛起的過程，格外重視分析這些國家如何在困境中崛起、在衰弱中振興的經驗。

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後，於1861年實行了廢除農奴制改革，使國勢在困厄中走向富強。這最先引起魏源的注意，他在《海國圖志·籌海篇三》中寫道：“西史言俄羅斯之比達王（即彼得一世）聰明奇傑，因國中技藝不如西洋，微行遊於他國船廠、火器局學習工藝，反國傳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洲最雄大國。”之後，洋務派、早期維新思想家格外關注俄羅斯“自其前王彼得羅以來，中間女后專政，悉能任權術，羅英俊，內修外禦，名震鄰國”^③；“俄自前皇彼得羅以來，慕效西洋政俗，講求製造，風氣日開”，雖跌跌撞撞，但終於邁開了現代化的步伐，“西洋且視為最強之國，各有瞠乎其後之勢”。^④普魯士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中打敗法國，從備受欺凌的弱國崛起而為歐洲舉足輕重的強國。王韜（1828—1897）於1873年出版了二十餘萬字的《普法戰記》，對普魯士從“曩者為法所制”，到“卒能雄長歐洲，高執牛耳”的崛起過程，多有着墨。俄、普的快速崛起，給王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普崛起後，王韜對世界格局做了新估計：“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⑤法國在遭到慘敗之後，並沒有一落千丈，且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不勝而勝”，其衰而復振的經驗，對正遭受磨難並為尋求復興之路而努力的中國人而言，是深刻而有益的啓示。邵作舟（1851—1898）在《變法自強疏》中指出：“昔普、法之戰，法之名城殘破幾盡，電線鐵路處處毀裂，賠償兵費計五千兆佛蘭克，其數且十倍今日之二萬萬兩。然法人自定約後，上下一心，孜孜求治，從前弊政，一體蠲除，乃不及十年，又致富強，仍為歐洲雄大之國，論者謂較盛於拿破崙之時。”中國也當力求重新振作，“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將見雄長海上，方架歐洲，舊邦新命之基，自此而益鞏，豈徒一雪割地賠費之恥而已！”^⑥

東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轉弱為強，更使洋務派、早期維新思想家感覺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並深以為憂。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李鴻章（1823—1901）在寫給曾國藩（1811—1872）的書信中就指出：“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

^① 甘豫立：“土耳其之復興”，《復興月刊》2（1932）。

^② 陳振鷺：“全民連責與民族復興”，《復興月刊》6（1932）。

^③ [清]王韜：“俄人志在兼併”，《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韜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第232頁。

^④ [清]薛福成：“論俄羅斯立國之勢”，《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薛福成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第265頁。

^⑤ [清]王韜：“變法自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韜卷》，第198頁。

^⑥ [清]邵作舟：“變法自強疏”，《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馬建忠邵作舟陳鷗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322頁。

槍炮輪船漸能製用，遂與英法相爲雄長。”^①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崛起爲強國，並很快走上了對外擴張之路，於1874年侵犯中國臺灣，李鴻章感覺到日本“必爲中國肘腋之患”“誠爲中國永遠大患”，他說：“目前惟防日本爲尤急，詢屬老成遠見。該國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每爲識者所譏，訪聞初頗小哄，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爲識者所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臺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爲中國永遠大患。”^②早期維新思想家紛紛稱讚日本通過開國迅速取得成功，並意識到中國自強之圖、振興之舉不可“一日稍緩”。王韜指出：“日本，海東之一小國耳，一旦勃然有志振興，頓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國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則惟恐其入之不深。”^③稱讚日本通過學習西方、通過“師其所長”“求立乎泰西諸大國之間”，取得了富國強兵之效。薛福成（1838—1894）指出：“日本國小財匱，其勢原遜於泰西諸邦，惟該國近來取法西人，於練兵製器各務，刻意講求，頗有振興氣象。”他認爲中國當“同心効力，以圖自強之要，則敵國外患，未必非中國振興之資，是在一轉移間耳”。^④邵作舟指出：“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爲泰西所推服，是廣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日中國關鍵，全繫乎此。”^⑤黃遵憲（1848—1905）於1887年寫成《日本國志》，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悉從西法”“無一不取法於泰西”並迅速取得成功的情況。

中國在1895年、1901年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後，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迫在眉睫，這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中華民族觀念、民族復興觀念開始生成。致力於探索民族復興的各階層人士，在關注殖民地國家的“亡國史鑒”的同時，也重視借鑒當時世界大國的建國、興國與強國的經驗。一些專門反映西方國家、反映日本建國興國的作品得以問世，這些作品如梁啓超1902年下半年發表的《意大利建國三傑傳》、1904年完成的《新大陸遊記》，宣樊子（林獬）1901年發表的《美利堅自立記》《俄土戰記》，姜寧氏《美國獨立史》（章宗元譯，譯書彙編社，1902），灑江保《美國獨立戰史》（兩個版本：中國東京留學生譯，商務印書館，1903；作新社，1903），無名氏《美國獨立史別裁》（清河譯，上海群學社，1906），《意大利獨立戰史》（東京留學生譯，商務印書館，1902），松井廣吉《義大利獨立史》（張仁普譯，廣智書局，1903），《意大利獨立戰史》（作新社，1903），《意大利建國史》（一新書局，1903），日本高山林次郎《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羅孝高譯，廣智書局，1902），《荷蘭獨立史》（《江蘇》，1903），柳井絅齋《希臘獨立史》（秦嗣宗譯，上海廣智書局，1902），《葡萄牙革命史》（商務印書館，1911）等。

在甲午戰爭爆發後，維新派、革命派的上書、政論、講演與宣傳品中，也常常引述列強尤其是日、俄通過變法或改革振衰起弊、由弱變強的歷史過程。維新派主要領袖康有爲在《上清帝第一書》中稱，“日本崎嶇小島，近者君臣變法興治，十餘年間，百廢俱舉，南滅琉球，北闢蝦夷，歐洲大國睨而莫敢伺”^⑥；在《上清帝第二書》中稱，“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製新器”，遂能侮我，而“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習其業，歸而變政，故能驟強”；^⑦在《上清帝第三書》中稱，“俄、日能變法，遂威行東方”^⑧；在《上清帝第四書》中稱，“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近者其酋睦仁與其相三條實美改紀其政，國日富強，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臺”^⑨。梁啓超在1896年的《變法通議》中引述了俄、德、日振衰起弊的興國經驗：“今夫俄宅苦寒之地，

^① [清]李鴻章：“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李鴻章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第5冊，第3142頁。

^② [清]李鴻章：“籌辦鐵甲兼請遣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6冊，第170頁。

^③ [清]王韜：“變法自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韜卷》，第200頁。

^④ [清]薛福成：“代李伯相復陳迭奉寄諭分別籌議疏”，《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薛福成卷》，第92—93頁。

^⑤ [清]邵作舟：“變法自強疏”，《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馬建忠邵作舟陳虬卷》，第330頁。

^⑥ 康有爲：“上清帝第一書”，《康有爲全集》，第1集，第183頁。

^⑦ 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爲全集》，第2集，第36、44頁。

^⑧ 康有爲：“上清帝第三書”，《康有爲全集》，第2集，第80頁。

^⑨ 康有爲：“上清帝第四書”，《康有爲全集》，第2集，第83頁。

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后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闢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爲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①他在 1900 年的《少年中國說》中，以“少年意大利”言說“少年中國”：“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②嚴復在 1895 年發表的《原強》一文中，以日爾曼、法蘭西之例子，說明戰敗不足喪志、衰弱可再圖強，以激勵國人光復舊物、致力復興：“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戰敗何足以悲。今且無論往古，即以近事明之；八百三十年，日爾曼不嘗敗於國法乎？不三十年，灑恥覆亡，蔚爲強國。八百六十餘年，法蘭西不嘗破於德國乎？不二十年，救敝扶傷，哀然稱富。論世之士，謂其較拿破侖之日爲逾強也。”^③

革命派領袖孫中山 1894 年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成爲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源頭。他在同年的《上李鴻章書》中提到了日本明治維新：“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成效已大有觀。”^④1905 年，他在演講中又提到了日本崛起：“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⑤他晚年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又結合日本的例子談到國家復興時指出，中國現在的處境是“次殖民地”，“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我們要迎頭趕上，爭取“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祇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國人一起致力於“恢復民族的地位”，有朝一日，“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⑥在辛亥革命前夕的其他政論中，留學生、革命派也紛紛援引西方大國在困境中崛起的歷史經驗。如 1901 年《國民報》第 1 期刊載《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指出，20 世紀世界萬國“以有民權而興，無民權而亡”，“夫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歐洲數強國，其民之受壓抑束縛奴隸牛馬暴虐殺戮固無異於中國之今日也。然卒不逾半世紀，而竟脫除壓抑束縛之禍，奴隸牛馬之役，暴虐殺戮之慘，皆成新造獨立之雄邦者，豈非自一二傑士，昌明公理，大聲疾呼，起通國之民心，勃然奮發而致之乎？”國民應認清民族復興的責任，“必使我中國之文明，造乎極域，風潮披靡於歐美”。該報刊出的《中國滅亡論》一文，引述了美、法、意、希、日本等國“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渡過難關而崛起振興的例子，稱美國“其初受英之壓制，蓋無異於今日之中國”，但十三州志士“起兵以拒英”，“血戰七年，卒得獨立，爲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國”；意大利曾“爲奧國所箝制”，“志士痛之，仰天號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統一之說，其後當法國之革命及日爾曼之變動，影響所及波於半島，意人遂離奧自立，而渙散各州遂一日歸於統一”；“法之敗於德也幾不國矣”，其國志士“廢帝政以易民主，未幾而雄長歐洲矣”；希臘“隸於土耳其版圖者，四百有餘年矣”，舉國奮起抗爭，“卒賴各國之助，而以黑子彈丸巍然獨立於地中海”。^⑦

民國時期的民族復興思潮，對西方強國的興國經驗也多有借鑒。五四時期，陳獨秀（1879—

① 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選集》，第 11 頁。

②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梁啟超選集》，第 125 頁。

③ 嚴復：“原強”，《嚴復集》，第 1 冊，第 9 頁。

④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5 頁。

⑤ 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講”，《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83 頁。

⑥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9 卷，第 252—253 頁。

⑦ “中國滅亡論”，《國民報》2—4（1901），《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 1 卷上冊，第 81—82 頁。

1942)、李大釗(1889—1927)等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強調民族復興寄希望於國民，尤其是寄希望於青年。陳獨秀指出，吾國“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反觀“法美日本國民之運動，非一黨一派之所主張所成就”。他要求青年“從事國民運動，勿囿於黨派運動”。^①李大釗以德、意等國經驗，闡明青春中華之再生，需要提振國民精神，需要提倡民族主義，需要青年承擔起民族興亡之責任。他指出：“發揚蹈厲以樹國民的精神，億辛萬苦，則德意志帝國之建立、意大利之統一，其最著矣。國民的精神既已勃興，而民族的運動遂繼之以起。於是德國則倡大日爾曼主義(Pan Germanism)矣，俄羅斯、塞爾維亞則倡大斯拉夫主義(Pan Slavism)矣，英吉利則倡大盎格魯撒克遜主義(Pan Anglo-Saxonism)矣，他如美之守孟祿主義，日本近來之倡大亞細亞主義。”^②尤其是德國的“青年德意志運動”“揚佈人生復活國家再造之聲，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國建於純美青年之手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統一，纔二十載，距今亦不過六十餘年，而其民族之聲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餘”。^③因此，他強調中華民族更生再造，必須倡導“新中華民族主義”“舊民族之復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為此，李大釗等人發起了“少年中國運動”，借鑒意大利革命者瑪志尼(G. Mazzini, 1805—1872)創立少年意大利團體的經驗，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

在“九一八事變”後興起的民族復興思潮中，新中國建設學會於1933—1934年出版了《興國記》第一、二集(趙正平主編，書林書局)，《復興月刊》等報刊於1932年始相繼發表了孫幾伊《戰後德國人民對於復興底努力》、壽宇《歐戰後意大利的復興》、蘭坪《日本明治復興後產業發展之趨勢》、陳其剛《馬克維尼與中國復興》、高承元《論美國經濟復興運動》、王雨桐《美國復興運動之總檢討》等文，借鑒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對中國復興提出相關建議。在政治建設方面，由於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N. Machiavelli, 1469—1527，時譯“馬克維尼”)主張結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狀態，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主張“應該不顧一切，祇求可以挽救國家的危難，維持國家的獨立”，因此，陳其剛稱馬基雅維利“為當時的意大利開闢了一條光明的途徑，為今日的意大利造成了復興的基礎”，“中世紀的意大利與今日的中國，在實質上都是支離破碎的局面”，“意大利因馬克維尼偉大的學說，得到了光榮的復興”，“我們不要復興中國則已，要復興中國就必須步着馬克維尼的後塵努力前進”。^④在經濟復興、產業復興方面，資耀華主張全面分析國際經濟環境，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家應對經濟恐慌的政策，如緊縮財政、“溝通農村與都市之金融”“增進中下階級及農民之購買力”^⑤；張水淇主張借鑒“歐洲之產業革命”經驗，如“近代之資本制度”“大規模經營”的近代生產之模型，適應大工業的交通設施；^⑥蘭坪認為民族復興的原因多而複雜，日本明治維新“可說是日本民族的復興”，與其產業政策上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值得借鑒；^⑦錢承緒主張借鑒德國重視人才的經驗，“拿德國來說罷，在巴黎和會之後，我們都知道她在經濟上受有很大的創痛，但是至一九一八年以後，她國內各種企業，仍在創痛中，不斷地增進，這就是國家對於人才同事業能夠積極的培養，人才一多，發明自然也愈多，到了結果，各種企業就能依賴於人的力量，而壓倒一切之一切”^⑧。在教育興國方面，百剛談到日本、德國重視教育的經驗，指出“要使國家和民族復興，非從教育着手不為功”，“我們知道一八四八年時候的德意志，支離滅裂，幾乎不成一個國家。五十年前的日本，諸藩分立，‘黑船來襲’的時候，何嘗有近代國家的形態。但一則終於統一，一則維新告成。讀歷史的人，沒有一個不將德意志的復興和日本的崛起歸功於教育的”。^⑨在恢復民族精神方面，時人非常重視民族

^①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上冊，第104頁。

^②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上冊，第301頁。

^③李大釗：“《晨鐘》之使命”，《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80—181頁。

^④陳其剛：“馬克維尼與中國復興”，《復興月刊》1(1933)。

^⑤資耀華：“經濟復興與經濟政策”，《復興月刊》1(1932)。

^⑥張水淇：“產業復興之進路”，《復興月刊》1(1932)。

^⑦蘭坪：“日本明治復興後產業發展之趨勢”，《復興月刊》2(1932)。

^⑧錢承緒：“復興中國產業的對策”，《復興月刊》1(1935)。

^⑨百剛：“教育之復興”，《復興月刊》5(1932)。

精神在德意志民族復興中所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費希特（J. G. Fichte, 1762—1814, 時譯“菲希德”）發表的《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直接助推了“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復興思潮的興起。當時的《再生》《復興月刊》《大公報》等有多篇文章提及這篇講演，指出“那時有一位大思想家，深信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的能力，深信德國的復興在民族精神的喚起，在新教育的提倡”^①，認為“民族之因道德的墮落而亡者，惟有道德的改造足以振之，此菲氏立言之根本精神也”^②。在文學復興、文藝復興方面，主張借鑒西洋“復興時代的文學”“復興時代的精神”，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像“法國革命時的國歌，英國培根的政治科學論文，美國林肯的演說辭”^③。

四 模式探尋：學習西方、回歸東方與“第三種文明”

中國近代思想家在探索世界各國興亡經驗的基礎上，將其與中國國情、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結合，對民族復興的實現途徑從不同角度做了不盡一致的探索。他們高度重視“列國經驗”，但也對自身文化、民族特性、“中國元素”充滿自信。例如，寰忠撰文認為，中華民族“為極端愛好和平之民族”“為抵抗力極富之民族”“為同化力極大之民族”“為蘊藏極大富力之民族”，深信“我五千年之文化，五千年之歷史，危而不亡，顛而不傾，固自有精湛之特性，而非其他民族所能企及者”，深信“吾儕生而為中華民族，不徒負復興民族之責任，直負復興世界之責任”。^④他們力求把借鑒“列國經驗”與立足“本土視野”有機結合起來，從早期學習外國模式以謀求民族振興，再到日漸重視中國國情以探索“中國道路”。仔細觀察其軌迹，大致經歷了從學習西方、回歸東方到創造“第三種文明”的演變。

——學習西方。在近代早期，先進的中國人主要是向西方國家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通過借鑒西方來探索民族復興的實現途徑。鴉片戰爭時期、洋務運動時期，還是比較籠統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采西學，製洋器”“師夷智以造炮製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19世紀末，開始具體效仿、學習某一個國家、某一兩個國家。維新派要求，效法俄、日以變法自強。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提出：“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法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昔彼得為歐洲所擯，易裝遊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視東方。”^⑤為了仿效俄、日以推行改革，康有為編纂並向光緒帝進呈了《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革命派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尤其提倡學習美國。鄒容（1885—1905）在《革命軍》中“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把革命後建立的國家定名為“中華共和國”，並提出了二十五條建國綱領；孫中山主張向美國學習，實行民主共和，其三民主義就受到美國林肯（A. Lincoln, 1809—1865）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深刻影響。陳獨秀等嚮往、推崇法蘭西文明，早在1903年就曾以“秦風”為筆名發表《讀〈法國革命史〉作革命歌》；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發表了《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等推介法蘭西文明的文章，認為“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蘭西拉飛耶特（Lafayette 美國獨立宣言書亦其所作）之‘人權宣言’刊佈中外，歐羅巴之人心，若夢之覺，若醉之醒，曉然人權之可貴，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貴族，列國憲章，賴以成立”，“由斯以談，人類得以為人，不至永淪奴籍者，非法蘭西人之賜而誰耶？”並認為近世歐洲三大文明——人權說、進化論、社會主義“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⑥曾琦等主張效法瑪志尼的少年意大利黨模式，發起少年中國運動。後來民主黨派的“中間路線”，則以建立英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為主要目標。

① 翟菊農：“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節本序”，《再生》7（1932）。

② 張君勸：“菲希德《對德意志國民講演》摘要”，《再生》3（1932）。

③ 劉麟生：“復興時代的文學”，《復興月刊》1（1935）。

④ 寰忠：“中華民族復興與世界之關係”，《復興月刊》1（1932）。

⑤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6頁。

⑥ 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第79—84頁。

——回歸東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西方文明的缺陷、弊端得以充分暴露，使中國思想界對西方文明發生了從嚮往、羨慕到懷疑、反省的思想轉向。與此同時，對中國國情日漸重視，對“中國經驗”、自身文化的自信不斷增強。杜亞泉（1873—1933）指出：“近年以來，吾國人羨慕之西洋文明無所不至，自軍國大事以至日用細微，無不效法西洋，而於自國固有之文明，幾不復置意。然自歐戰發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吾人對於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其懷疑之意見。”^①一部分知識分子把眼光從西方轉回東方，把民族復興希望寄於民族文化復興，把中國命運歸結為中國文化的命運。梁漱溟（1893—1988）提出，“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賀麟（1902—1992）提出，“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會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②。錢穆等人，則闡述了中國文化復興論、儒學復興論。

——“第三種文明”。李大釗率先提出突破東西文化二元結構的“第三種文明”論。1916年8月17日，李大釗發表《“第三”》一文，稱“第一文明偏於靈；第二文明偏於肉；吾寧歡迎‘第三’之文明”^③。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又撰文指出：“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種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④1925年，張申府（1893—1986）提出了創造吸收中西文化之優長的“第三文化”；在20世紀30—40年代，還提出了中、西、馬“三流合一”的思想^⑤，認為“合孔子、羅素、列寧而一之的新體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國的新指標、新象徵”^⑥。之後，又不斷有人闡述、探求過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礎上創造新文明的主張與方案。他們強調，實現綜合創新，既要面向外部世界、吸收各國文明，同時也要立足中國國情、着眼中國實際。總之，在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思想融合基礎上，立足中國實際，實現綜合創造，探索“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化復興的發展方向。

①杜亞泉：“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誌》10（1916）。

②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思想與時代》1（1941）。

③李大釗：“‘第三’”，《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84頁。

④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冊，第560頁。

⑤方克立：“從曲高和寡到主流話語——張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歷史命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13）。

⑥張申府：“家常話”，《張申府文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卷，第434頁。